书评·动态

解读清代秘密社会的文化密码
——《文化与叛乱》简评

池子华 朱琳

刘平博士的《文化与叛乱》一书，是以清代秘密社会为对象，从文化角度研究农民反抗问题的。该书由商务印书馆于 2002 年 11 月出版发行。我们通览全书，颇多感想——作者脚踏实地，勤于思索，为学术界奉献了一本视野开阔、内容丰富的好书。

一

该书的研究视角新颖而独特。这主要体现在：其一，拓宽了秘密社会史研究的视野。秘密社会史研究是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里的一株奇葩，其成果固然骄人，但研究者们主要从事件史、政治史的角度，聚焦于会党、教门的形成、发展、演变及其活动等的考证和争论。本书独辟蹊径，从文化层面对清代秘密社会进行剖析。当然，秘密社会与文化的关系在此前的研究中也偶有述及，但大多零星地散布于相关论著中。本书首次把两者的关系作为一个专门课题，进行集中、综合地论述，开启了秘密社会史研究的新方向，拓宽了其研究视野。对于启发研究者从多维视角观察秘密社会，从而形成丰富的、多层次的研究体系大有裨益。

其二，为农民反抗史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包括秘密社会造反在内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曾被誉为新中国史学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其成果之丰毋庸赘言。然而，结合文化的论作寥若晨星。本书作者独具慧眼，从文化传统这个全新的角度，对中国农民反抗的许多问题重新审视。这既是冲破“阶级决定论”之举，也便于客观、公允地看问题。对于因丧失政治光环而暗淡失色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来说，无疑平添了许多生机。

其三，本书以文化（主要是下层文化）为观察视角，其价值非同一般。传统中国是一个文化积淀颇深、文化取向极为浓厚的社会，文化在人们的行为、活动特征上烙下深深的印迹。但不同群体因阶级地位、经济条件等不同，在文化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秘密社会的主要群体是破产农民、城市平民、手工业者、运夫、船民、僧道医卜、散兵游勇等。他们深受下层文化、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环境熏陶，并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将对其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进一步说，秘密社会就是这种下层文化的典型产物。因此，只有从下层文化出发，才能从更深层次上把握秘密社会及其叛乱的思想源泉和活动特征。关于这个视角的重要性，加拿大学者王大为曾认为：在中国秘密社会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对民间文化兴趣甚少，但其可以作为将

[收稿日期] 2003- 9- 12
[作者简介] 池子华（1961—），男，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朱琳（1977—），女，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苏州 111111

来共同研究的方向之一 (【加】王大为著，曹新宇译《一个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的看法》，《清史研究》2000 年 2 期)。同时，下层文化仍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被遗忘的角落”，本书将会唤起人们，尤其是倡导“自下而上”治史理念的社会史学者对下层文化的关注和重视。

二

该书初步梳理出清代秘密社会丰富繁杂的文化内涵，清晰地展现了秘密社会与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这是本书的一大突出贡献。

为更好地理解清代秘密社会的文化内涵，作者在第一章里用相当大的篇幅，以弥漫于当时民间最为浓厚的两种信仰——巫术与宗教为着眼点，考察了清代秘密社会存在的社会文化环境，认为无论是巫术还是世俗化的宗教及宗教异端思想，它们是秘密社会信仰的主要源泉。广而言之，民间文化、民间信仰等文化传统是孕育清代秘密社会思想与行为的文化土壤。

对清代秘密社会文化内涵的透析，是本书的重头戏。全书除导言、结论、第一章外，其余篇幅都用于阐释秘密教门、会党中承载的文化因素，其中第二章主要对秘密教门的经卷以及导致叛乱的核心教义——“劫变观”、“八字”真言与“反清复明”思想进行分析，第三章详尽探讨巫术、符咒、禁忌、气功等文化现象在秘密教门及其叛乱中的表现，第四章分析秘密会党中的歃血盟誓、江湖义气、巫术、宗教、拜把结会、分类械斗等文化现象。作者采用浓墨泼撒的笔法，首次较为集中、详细地向人们展示了秘密社会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并为此项研究走向更加深入、系统和全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对上述文化内涵的梳理中，作者或察人所未察，如发现了秘密教门中的“反清复明”思想以及秘密会党中的巫术、宗教、迷信现象；或明人所不明，最为典型的是对于秘密教门中那些使人不明就里的因素，书中采用分类、列举甚至比较的方法，对其作出较为细致的清理 (主要包含巫术、魔术、法术、符咒、谶语、谣言、揭贴、占卜、扶乩、乩语、戒律、誓词、纪律、隐语暗号等)，从而揭开了秘密教门“神秘”的面纱；或不囿陈见，勇于提出新观点，如对宝卷的重新分类和性质判断，对林爽文起义有关问题的分析，对秘密会党“忠义”思想的评判等，无不让人耳目一新，从而使之成为本书的亮点。

还需指出的是，本书揭开了秘密社会与文化传统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简言之，文化对于秘密社会来说，是其信仰的源泉以及能够吸引民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制定内部日常行为准则的依据，从而使组织得以维系；是动员、组织民众叛乱的现成武器；在叛乱过程中，又是鼓舞士气、振奋人心，从而提高战斗力的工具。可以说，深深扎根于民间文化环境之中，广泛借用文化因素得以生存、发展甚至走向叛乱，是中国秘密社会的一大突出特征。因此，本书为解读中国秘密社会的独特性、神秘性及其顽强生命力，找到了一把金钥匙——文化传统。而秘密社会中的文化现象，如“劫变”观念、巫术、迷信、符咒、谶语、歃血盟誓、拜把结会等，基本是对民间文化、习俗、信仰等的吸收和改造，与主流文化呈现相左或相对立倾向，这体现了作为中国社会文化体系中一个重要的亚文化群体的文化取向特色。

三

作者探讨秘密社会与文化的关系，旨趣在于重新审视包含秘密社会叛乱在内的农民反抗问题。其深刻、独到的见解是本书思想精髓所在。

其一，关于农民反抗的原因。以往研究者大多把其归结为阶级矛盾的激化、经济及自然条件的恶化等客观因素。本书作者认为历史上的农民反抗问题，原因复杂，诸如宗教异端、社会习惯、民族冲突、土匪活动等往往也会导致叛乱。书中所考察的个案——林爽文起义，其重要诱因就是当地分类械斗这种社会习俗。因此，为避免偏颇，在研究农民反抗时，既要注意客观因素，也要考虑主观因素 (本书第 42 页，下文出自本书仅注页码)。主观因素也可以被理解为叛乱者的主观作用。其中，叛乱

领袖的作用不可低估。他们往往因膨胀的野心而发难，并以特殊的社会阅历、超人格的魅力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同时，文化传统对叛乱者具有深深的影响。尤其是秘密社会的信仰因素，如秘密教门的“劫变”观念、“八字”真言以及“反清复明”思想，就是导致叛乱的思想根由。因此，作者推断农民叛乱不纯粹为被动行为，有时也是一种主动行为。当然，更多的是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第346页）。

其二，关于农民叛乱的特征和方式。农民叛乱广泛借用了他们所处社会的文化因素，尤其是宗教因素（或宗教异端思想）（第346页）。这种利用现世的文化结构功能进行反抗，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作者曾在书中的第一章回溯了历史上诸多的农民反抗。自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起义始，就凭借其崇拜、迷信的事物如卜、鬼信仰等作思想武器。后世的农民反抗大多利用了宗教（尤其是宗教异端）、巫术、神话、戏剧、结拜习俗、非宗教性结社传统等多方面社会文化现象。尤其以秘密社会为主导力量的农民反抗，以文化作武器更是普遍现象。可以说，文化传统因素不但为农民变为叛乱者架起了桥梁，也使其在叛乱过程中迸发出巨大的勇气和力量（第347页）。

其三，关于农民反抗的类型及其历史作用的评价。作者认为以往人们仅用“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来涵盖农民反抗是不够的，用经济性斗争、政治性斗争来划分也有局限。由此提出以是否具有推翻现政权的目标及其相应的活动内容划分成两类：一是反社会行为（一般的民变、土匪活动、械斗等），一是反政府行为（如清代秘密社会在“反清复明”、“劫变”、“争天夺国”观念指导下的叛乱）。并特别指出：大多数秘密社会的叛乱，尽管其思想信仰中包含有明显的反政府倾向，但一般都旨在敛钱、抢劫等，应归于反社会类型。另外，规模浩大的叛乱未必属于反政府性质（第348页）。此种分类标准的合理性、可行性虽有待考证，但其进步性、开拓性不可否认。

作者进一步认为不管是何种类型的农民反抗，都不能一概视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力量。尤其是秘密结社发动的叛乱，更不能笼统地看成农民“革命”。这与叛乱者的文化观念、思想水平有着密切关系（第348页）。从本书所揭示的秘密社会的信仰及在叛乱过程中所利用的文化因素来看，更多的是封建文化糟粕。其荒诞不经一目了然，盲目性、落后性、保守性也非常明显。从秘密社会的活动来说，其在叛乱过程中的大肆破坏，很多时候是针对一般民众的，这样，其阴暗面和消极面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切不可因为其曾发动过反封建斗争而予以一味的肯定（第349页）。也就是说历史上的造反并不一定有理。这对于一度完全赞扬农民起事的观点，无疑是重大挑战。不过，此观点在近年来的史学研究中已有注意，本书作者以其锐利的眼光、深邃的思考，从文化方面作出了进一步的印证。

四

作者以高度的时代责任感关注现实，对于正确认识、预防、处理当今的社会反抗倾向具有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

中国是个农业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今天，农民问题仍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由于种种原因，农民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并未熄灭。基于此，作者认为“有必要深入研究历史上的农民反抗问题”，以达到“预防和处理今日农民‘反抗’倾向。”而比照历史，发现“以往农民叛乱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在今日已经削弱或不复存在，但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文化观念、习惯势力仍像梦魇一般缠绕着中国的农民阶级”（第342页）。因此，作者发出强烈的呼吁：“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同时，由种种文化因素孕育而成的社会反抗问题仍然值得重视”（第14页）。当然，农民反抗形形色色，与之交糅在一起的还有黑社会与邪教等问题。

针对这些与现代化步伐不协调的音符，作者从文化传统与变迁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富有警世、醒世色彩的认识。首先，文化传统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现代的社会反抗，与负面文化传统有关。其次，许多文化传承的现象不受社会制度、社会性质的制约，如人们对巫术、宗教、谶语、谣言的迷信等。这些曾经是历史上秘密社会起事的工具，也是当今容易被别有用心者利用的“文化”因素，必需提

高警惕。再次，文化传统具有稳定性，但不是一成不变的，需注意现代社会反抗中利用文化现象的新特征。另外，本书的间接性启示也不可忽视，如书中分析秘密教门及会党因借用了文化内容，“在它们未曾起事、叛乱时，便‘合理’地蛰伏于民间社会”，“一旦时机来临，便迅速地掀起一场场波澜”(第291页)。这实际上是在警醒世人注意：当今社会中，在“文化”表象的遮掩下，进行预谋性活动的秘密团体和组织，一旦露出端倪，应采用教育引导甚或强制的方式把其控制在萌芽之中。

对于当今的社会反抗倾向，作者认为应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积极预防、合理引导、移风易俗、依法办事的态度和原则。尤其强调既要注意农民经济状况的改变，也要注重农民观念的改变和文化素质的提高(第353页)。这些见解无疑是对策性的启迪，具有建设性意义。

为了让一般民众更加深刻地认清当今邪教的本质，本书将我国政府认定的主要邪教法轮功与历史上的邪教作了对比。认为法轮功宣扬的“末劫”与“入教避劫”，利用宗教，排斥宗教，以巫术、谶谣、气功等术蛊惑人心，扩展组织，这些都是历史上邪教、会道门的惯用伎俩。从敛钱出发，以谋反终结，也是历史上邪教首领共同的野心和目标。这充分说明法轮功与历史上邪教的文化同源性。作者进一步指出历史上邪教曾有反封建的积极一面，而法轮功只具有破坏社会秩序、对抗政府的消极一面(第357页)。

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认为：“历史既是过去的科学，又是现时的科学。”说明历史具有服务现实的功能。作者正是本着这一理念，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对于农民反抗这种社会现象的历史渊源及消除这一现象的正确方向，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本书的特色和价值颇多，除上述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作者广泛地嫁接了宗教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社会学等理论和方法，并在文献的检索运用上，把触角也延伸到这些学科。

五

该书作为史学研究的一项新成果，优点和长处昭然，但不能说尽善尽美。

其一，正如秦宝琦先生在本书的“代序”中指出的那样：有些地方过于铺张，有些地方未能充分展开；宏观角度甚可，微观研究略嫌不足(第8页)。

其二，书中正文部分的标题分别是第一章：民间文化与民间信仰——中国秘密社会存在的文化土壤；第二、三章：清代秘密教门的文化内涵；第四章：清代秘密会党的文化内涵。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即本书重在探讨清代秘密社会的文化现象。至于中心论题“文化”与“叛乱”的关系未得到更明确、系统的阐述。尤为重要的是文化因素一般不会直接导致叛乱，其走向叛乱的催化剂和契机是什么？作者也未给予圆满的回答。

其三，本书认为“劫变”观念、“八字”真言及“反清复明”思想是清代秘密教门叛乱的根由。这容易使人误解为信仰是导致叛乱的惟一、绝对缘由。若在此置加限定词如“叛乱的思想根由”，则似乎更加合理。同时，这些信仰因素往往只是大多数普通的叛乱者起事根由。对于煽动叛乱的领袖而言，最根本原因可能还是野心和私欲，应区别对待。

其四，作者对农民反抗的类型划分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即结合其目标和相应的活动分成反社会和反政府两种，但尚未作深入、具体的探讨，不免留下一丝遗憾。

最后，笔者受本书启发，对于继续研究提出些须拙见。针对清代秘密社会势力空前膨胀的现象，以往论者多从政治、经济、社会学角度寻根觅源，能否从文化角度(如社会文化控制功能衰竭，主流文化的弱化等)予以弥补？清代秘密教门与会党在文化上有何共性和差异？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我们将拭目以待。

尽管本书尚有不完善之处，但瑕不掩瑜。它以新领域的开辟、新观点的提出、跨学科方法的运用以及对现实的高度关注而见长，可谓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兼具。它的问世，对秘密社会史以及农民反抗史的研究都起到了拓展、深化和推动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